

学校编码: 10384  
学号: 14020111150512

分类号\_\_密级\_\_  
UDC\_\_

廈門大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城市小区的善治之道：  
石狮市 H 街道三个小区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

Good Governance of Urban Neighborhood Spa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Governance Patterns  
in H Sub-district of Shishi City

黄歆彤

指导教师姓名：李明欢教授  
专 业 名 称：社会学  
论文提交日期：2014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时间：  
学位授予日期：

答辩委员会主席：\_\_\_\_\_  
评 阅 人：\_\_\_\_\_

2014 年 4 月

##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 摘 要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微观体现。在回顾“国家-社会”二元范式与社区权力结构研究相关文献后，本文将研究视角落在最基层的“邻里小区”，试图观察不同权力主体的互动结构及策略。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展开小区治理研究，进而反思原有“国家-社会”二元框架的不足。

本文通过对石狮市H街道三个小区治理模式进行个案比较研究后发现，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H街道邻里小区存在着行政权力主导模式、市场权力主导模式及社会权力主导模式三种类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存在多种可能性。从“政府-市场-社会”框架来看，作为基层政府行政组织的居民委员会，扮演的角色是基层治理者而不是“双重代理人”。其力量虽有所弱化，但依附于更强势的组织以获得资源分配。

市场组织既存在“主导型”角色，也有治理“协调者”角色。业委会组织在治理过程中提供了非制度性权威资源如地方性人情或社会网络资源，扮演“搭档”角色。部分小区业委会呈现出主导治理的同时依赖小区代理人治理的双重特性。

研究发现，H街区小区治理策略下缺乏动员居民的有效参与。因此，在结论部分，笔者就如何将邻里小区这一客观存在转向建设“邻里共同体”从而达到小区善治的目标进行开放性讨论。石狮地区小区治理应当努力向多元主体参与方向发展，在建立稳固的公共空间参与平台的同时，构建邻里社会资本，推进邻里共同体形成，达成善治目的。

**关键词：**善治；城市邻里小区；权力结构

## Abstract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a microscopic embodi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After reviewing studies about authority structure research in "State - society" dualistic paradigm, the author focuses on neighborhood space, which is the smallest but daily unit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 author then tries to observe interaction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among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study in neighborhood governance in "State-Market-Society" framework and finally introspect the deficiency of "State - Society" dualistic paradigm.

Supported b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urban neighborhood spaces,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three governance patterns can be explored in H sub-district: Administrative-based model, Market-based model and Autonomy-based mod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s no longer dualistic but pluralistic, consisting of many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Market-Society" framework, neighborhood committee which is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cts as a governor rather than "double agent". However, the strength of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weakened so that the committee has to attach to more powerful organizations to gaining recourse. Market organization occupies the role of domination as well as coordinator. Owners committees provide non-institutional authorities such as local favors and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so that it can coordinate relations within market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and residents. But some owners committees present double peculiarities of domination as well as attachment of agent.

In the final part, it is concluded that actions and strategies of governance in H sub-district lack mobilizing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from residents. Then another question opens to discussion: how to transform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Neighborhood" into "Neighborhood Commun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good governance? It is supposed that governance of neighborhood space in Shishi City sh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pluralistic rather than single participation. Stable common platforms and neighborhood social capital should be formed to establish neighborhood community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aim of good governance.

**Key words:** Good governance; Urban Neighborhood Space; Authority Structure.

# 目 录

第一章 前言 .....	1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	4
第一节 理论背景及文献回顾 .....	4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9
第三节 论文框架与研究意义 .....	14
第三章 个案小区治理模式 .....	16
第一节 A 小区：市场权力主导模式 .....	16
第二节 B 小区：社会权力主导模式 .....	22
第三节 C 小区：政府权力主导模式 .....	28
第四章 小区治理模式比较分析 .....	34
第一节 三维互动框架下模式分析 .....	34
第二节 街区治理背景与差异的形成 .....	38
第三节 治理困境 .....	41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	43
参考文献 .....	46
附录 .....	49
致谢 .....	52

## Contents

<b>Chapter1</b>	<b>Introduction .....</b>	<b>1</b>
<b>Chapter2</b>	<b>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Methods.....</b>	<b>4</b>
Session 1	Literature Review .....	4
Session 2	Conception Definitions and Research Methods.....	9
Session 3	Framework of Study and Significance .....	14
<b>Chapter3</b>	<b>Patterns of Governance.....</b>	<b>16</b>
Session 1	A Neighborhood Space: Market-Based Model .....	16
Session 2	B Neighborhood Space: Autonomy-Based Model .....	21
Session 3	C Neighborhood Space: Administrative-Based Model.....	26
<b>Chapter4</b>	<b>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vernance Models.....</b>	<b>32</b>
Session	Analysis in “State-Market-Society” Framework.....	32
Session 2	Common and Different Background of Cases .....	36
Session 3	Dilemmas of Governance.....	39
<b>Chapter5</b>	<b>Conclusions and Discussions .....</b>	<b>41</b>
<b>Reference.....</b>		<b>44</b>
<b>Appendixs .....</b>		<b>47</b>
<b>Acknowledgement.....</b>		<b>50</b>

## 第一章 前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与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城市基层社区生活也发生剧烈转变。人口流动性增强、人口异质性与密集度激增等现状加大了我国社会管理的难度;生产发展推动了居民从单一的物质需求扩展为精神、文化娱乐、休闲等多层面需求。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与居民对提升生活品质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社区服务的期待与依赖程度。基层生活的变迁推动着社会管理方式与城市公共服务模式从“单位制”到“街居制”的转变。“单位制”的显著特征是全能型治理结构,即国家全面掌控社会领域。“街居制”则逐步弱化了国家的控制色彩,职工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被迫从单位剥离,回归至行政区划“街居”体系中。

90年代中期,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的需求与户籍制度松动带来的城乡大规模流动等因素,倒逼基层社会承担大量问题和矛盾。社会压力像“漏斗”一样迅速汇集到了基层生活单元。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承担了管辖范围内近乎所有人口的服务工作,“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这一民间俗语形象地反映了“街居”体系超负荷的工作量。但即便这样的工作强度也很难从容应对人口激增、城乡流动加速所带来的巨大压力。除了高强度的工作量,“街居制”模式也存在若干问题,如以人为本、服务的理念尚未成为基层完全的行动指导,旧式管理理念、动员思维依然根深蒂固;管理主体依然是政府组织,缺乏非政府的参与。上述问题在挑战原有社会秩序和治理模式的同时,重新配置社区资源与治理权力,促进社区不断发展。以服务而非管理为核心的“社区制”应运而生。“街居”体系的服务工作依然落脚于基层社会单元,但更加强调居民参与以及满足民众需求,回应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需要。

除了社会治理变革的背景,还需要追溯的是国家住房产权私人化改革背景。这一改革推动了社区权力秩序初次变革。1998年,《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终结了原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首次强调社区物业管理的社会化、专业化及市场化,突出建立物业管理体制的重要性。住户与住房管理者的关系随之由“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转变为“服务”与“被服务”关系。五年后,《物业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了物业公司的义务及业主委员会的权



利，旨在更好地保护房屋产权所有人的权益，但缺乏对物业公司的约束与规范。2007年新修订的条例强调业主自治权力。从政策修订中不难发现，涉及的治理主体突出强调了业主的自治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推动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

国内社区建设进程有力地回应了治理变革的需求。2000年开始的国内社会建设运动，经历了十多个年头的摸索，已逐步总结出若干有效的基层政权体制及社会整合机制。以“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为代表的社区建设实践案例，丰富了国内的社区研究成果。“上海模式”建立了以党委为核心，行政管理、小区自治以及社会参与多方合作的治理格（任远、章志刚，2004），组织间相互配合形成“条块结合”的新型管理体制。“沈阳模式”的核心是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架构达成社区自治目标。“江汉模式”则通过政府主动转变职能的策略，调整政府与社区间关系的同时实现居民对社会事务的自我管理。以上模式研究旨在为现存的社区治理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主要模式都以自上而下的政府组织结构、职能调整以及治理策略设计为切入点，通过制度和服务的供给建立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然而模式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动员非制度性资源，否认治理秩序“内生”的可能性。

我国社会治理体系改革进程，首先体现在制度文本的调整上。十八大提出了建立“社会管理体制”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明确了“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利用计划、分工合作、协调、制度与组织结构设计等方式对群体进行整合，而治理体制则突出多元社会组织比如权力部门、公共部门、社会经济组织、民间组织在公共事务上的平等参与方式。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意味着治理体系从单一主体的组织式整合转变为多元合作主体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

在宏观社会治理变革背景下，我国城市社会治理正走向社区治理（李培林，2003）。街区作为最末端的社会单元，其发展状况不仅是居民生活质量的衡量尺度，也是促成社会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实践场域。随着社会转型，社区也从依赖于亲属、邻里和朋友关系的“礼俗社会”（滕尼斯，2010：45）转变为依托各种各样专门化分工的组织与网络的“法理社会”（滕尼斯，2010：46）。即使有相似的社区情境，居民互动形态也因为主体目标与运行规则的多元性，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治理模式与权力秩序。

本研究尝试将治理研究的切入点落在社区中最末端的生活单元，试图通过

“邻里小区”日常生活主体的互动关系，辨认小区治理模式、权力结构及治理策略。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由传统“单位制”向“街居制”、“社区制”转型的大背景下，处于治理进程中的政府、市场与自治权力主体呈现出何种互动模式？不同主体行动策略如何？研究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反思以往“国家-社会”二元范式的矛盾？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 第一节 理论背景及文献回顾

哈耶克提出，“最广为现代人承认的秩序类型是通过人为意志设计出来的‘命令式秩序’”（哈耶克，1997）。治理作为一种秩序设计，不仅是一种静态结构也是一种动态的权力主体互动直至稳定平衡的过程。在当代中国“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政治需求推动下，治理理论在宏观层面为社会治理体系建立了新的理论支点，在中观层面为政策变革指明了技术方向。更重要的是，治理作为改革的缓慢过程，为微观层面的社区权力结构研究创造了客观条件。因此，治理与社区权力互动关系密不可分。目前学术界进行社区权力结构研究倾向于使用“国家-社会”研究范式。本文将首先梳理社区治理相关理论，进而从理论和社区实践两个层面梳理社区权力结构研究。

#### 一、 社区治理研究

治理概念兴起于 20 世纪后期。当时西方利益格局呈现出多元化，政治经济体制无法解决市场失灵和国家失灵所呈现的危机，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保障公民的利益。治理机制与理论研究应运而生。

目前最为权威的治理概念及其特征描述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转引自俞可平，2001）该论述突出强调治理作为过程、协调、持续互动关系、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特点。权力不一定来自于传统的政府权威机构，也可以来自市场、社会，或公私合作，强调非政府参与主体合作治理。

治理理论包含三种主要理论，即全球治理、民族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理论（夏建中，2012:4）。其中，地方治理理论通过具体地区层面的实践强调参与治理主体以平等的合作关系进行互动达成共同目标的可能性，将关注点集中于多种主体

相互依赖、协调与合作的现象。

我国的政府治理与管理密不可分。目前国内研究涉及社会管理理念和原则、参与主体、工具、内容和路径选择的创新等方面的内容（陈振明、耿旭，2013）。治理的目标在于追求善治，即“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的状态（俞可平，2001）。“不仅是要减少政府的作用而使之更有效率，而且是要将部分社会权力从政府和公共部门转移到个体和私营部门……最终将利于促进民主这一更高的目标”（俞可平，2000）。因此，治理强调的不仅是制度创新，更是权力让渡，建立与市场、社会相匹配的体系，实现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共同治理。所希望达到的均衡状态是能够“保持公民的‘社会需求’与政府的‘政治需求’尽可能一致，形成一整套上下互动的有效机制”（燕继荣，2010）。

从上述对治理概念、特征及目标的梳理来看，治理应当包含静态的结构研究和动态的过程研究两方面。其一是作为政策创新的制度性结构安排；其二是主体间权力关系互动、通过让渡与合作等有效机制达成治理目标的动态过程。本研究将关注点放在治理的第二个层面，即将治理视为动态权力互动过程。

我国社区治理实践背景缘起于“单位制”向“街居制”的转型。社区为了能够在承接政府任务的同时满足社会需求，成立了类型多样的组织，如物业管理组织、非营利社会工作组织、业主自治组织等。不同主体围绕公共事务呈现出的互动状态影响了社区建设进程。相关社区治理研究较多关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情况如社区服务、社区保障等，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对于如何有效整合不同属性与目标的组织，促成其合作共生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海伦·苏利文曾将“社区领导力、促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管理、培育社会资本”作为社区治理的三大核心主题（Helen Sull Ivan, 2001）。国内有学者也指出，社会资本培育作为治理手段（夏建中，2012：205），有利于培养社区治理的制度依赖，推动陌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转变，提高集体行动能力与自组织能力。这才是社区建设的根本（燕继荣，2010）。因此，社会资本应当被视为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

## 二、 社区权力结构研究

社区治理作为动态权力过程，不可避免与微观社区权力结构的形成与变化产

生联系。因此，社区是治理实践适宜的研究平台，便于通过主体间权力互动状态观察主体行动背后的逻辑与意义。

社区权力结构指的是决策人士或领导人士权力的分配（徐震，1985:80）。在长期社区权力结构实证研究中，西方学者产生了代理人主义路径和多元主义路径两种理论研究途径。前者认为社区权力主要掌握在商业代理人而非政府官员手中，他们通过密切的往来及社区事务的商讨结成权势。后者则认为，社区权力分散在多组织中，群体中都有各自的权力中心，权力必须与具体事件相联系（Hunter,Floyd,1953;Robert Dahl,1961，转引自何艳玲，2007）。这两种途径争论在于，社区治理权力究竟是集中于特定团体还是分散在不同群体之中。不足的是，研究仅探讨基本框架，似乎没有深究背后的行动逻辑。我国学者对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国家基层政权建设（费梅萍，2001；何海兵，2003；肖林，2012）及中观层面治理组织与制度变革（徐中振、李友梅，2003:15）。

在社区权力结构研究中，“国家-社会”二元范式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视角（肖林，2011）。学术界对市民社会研究存在两种争议。其一认为市民社会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实体社会资源，因此需要从制度或组织水平使用此概念；其二主张将市民社会视为价值基础或学术规范。国内研究倾向于实体社会资源概念，国家通过强制权力满足公共利益的国家机制（费梅萍，2001）。然而，实体社会资源概念也受到争议，主要质疑来自于西方舶来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否能够在我国构建起同样的学术框架。有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这种不完整来自于社会没有形成独立、自治的结构（费梅萍，2001）。

有学者试图消除两种层面之间的紧张，正因为对市民社会的探讨发生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市民社会的产生是必然的，需要“转向国家与社会具体互动关系的范式性的分析和研究”（邓正来，1996），以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杨敏则认为“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的中国经验应该是“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基本形态表现为“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三维合作框架（郑杭生，2011；杨敏，2011）。国家是“非统一的组织体系”，其权力与“社会力量”时刻处于互动，形成“社会中的国家”取向。该取向认为，国家中心和边缘部分在与社会群体互动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形态和效果，国家边界是“渗透而又蔓延的，难以精确界定的”（张静，1998）。这一取向打破了二元框架，突出国家与社会力量相互渗透与合作的可能性，揭示出中国社区治理区

别于西方社区建设之所在（何艳玲，2007；郭伟和，2010；王汉生、王莹，2011；王星，2012），符合中国社区治理动态过程的内在含义。

国家行为对城市变化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权力结构实证研究集中于讨论物业公司、业委会和居委会“三驾马车”之间的博弈过程及其形成的权力格局。相关研究围绕政府渗透与控制策略、政府与市场互动策略与政府培育社区策略展开（黄晓星，2013）。在社区中，国家权力的渗透是影响社区治理格局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这种渗入通过组织渗透、功能渗透和程序渗透得以实现（肖林，2013）。

已有研究在基层国家政权建设取向之上将居委会理解为“国家代理人”。原因在于，居委会作为政府的基层组织安排，掌握了社区内公共事务的大部分处理权力，已被行政化。也有学者认为在现有体制框架下，居委会是最重要的基层社会自治领域和自治组织。该论述强调居委会居民自治特征，试图突出居委会群众自治组织的属性（徐中振、李友梅，2003：97）。这两种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居委会“双重代理人”身份（何艳玲，2007：55）。郭圣莉（2010）认为目前国家权力对社区的控制与管理仍然具有合法性，因此居委会仍处于核心地位。有学者则认为需要持续关注法律与制度的作用。国家是连续不断的行政、法律和强制制度（王汉生、吴莹，2011），因此居委会在行政层面不能完全代替国家，其角色是行政服务提供者（桂勇，2007）。

居委会的制度能力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孙小逸、黄荣贵，2012）。为顺应不断变化的社区建设实践需要，居委会扮演基层治理者角色，其行动策略较全能政府时期更为隐秘化、柔性化也更具合法性基础，以完成日常政治动员满足政治需求（何艳玲，2007；刘威，2010；郭伟和，2010；王汉生、吴莹，2011；黄晓星，2013）。这种新的权力运作逻辑不仅依靠组织力量动员，还依靠人情面子策略，自治性在实现治理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以信任、互惠为基础的地方性网络与本土性资源成功被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有学者称之为“抽象化治理模式”，国家通过“不在场”与“制造在场同意”进行隐身治理，推动支持社会发展（王汉生、吴莹，2011）。

物业公司作为市场力量，是商品房改革后政府为弥补服务空白点产生的新主体。组织因提供专业化、市场化、服务化的物业服务产品，是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行为深深嵌入社区生活过程中（徐中振、李友梅，2003：89）。从不动

产关系这一原始关系入手，物业公司能建立稳定的社区管理体系（黄安心，2013）。在转型背景下，虽然物业公司的角色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提供者”，但部分物业公司仍存在路径依赖行为，仍然利用原有行政关系网络，维护既得利益（张磊、张丽敏，2005）。已有物业研究领域已被经济学与管理学分割，多数文章停留于分析物业管理的服务模式与存在的问题，与本文直接关联度低，不予展开。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政府与物业公司互动中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仲裁者”、“协调者”、“干预者”（张磊、张丽敏，2005）还是“制度提供者”（王星，2008），亦或“共建共生”关系（王汉生、吴莹莹，2011）？

社会领域由于组织化、制度化程度低，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弱势。学术界也因此讨论如何推动“社会”成为积极的行动主体，实现社会自治。业委会因符合塞拉蒙教授对非营利组织的定性，即“正规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六大特征，成为学者研究社会组织的雏形。在实践中，业委会的角色较为复杂，与物业公司、居委会的关系呈现出不完全契约关系、搭档关系与附属关系，在博弈中追求组织的利益均衡。由于以居委会为代表的国家权力部分退场，业委会被迫承担社会职能，成为嵌入社区结构的新生事物（汤艳文，2004）。这种嵌入意味着社会基础关系结构的根本转型，形成了新的公共空间（张静，2001；张磊，2005；李江新，2011），也因此创造了新的社会资本、社会身份与社会关系。有学者认为，业委会不能完全脱离其他力量的影响而仅代表业主利益（李江新，2011）。“社区制”背景下街道办与居委会转变为权力实体，业委会功能则陷入形同虚设的困境（陈淑云，2009），甚至倾向于房地产商利益集团（张磊，2005），无法达到自治。部分业委会的行动策略可被视为对原有体制的“反向渗透”，如通过更温和的手段争取居委会的支持与合作（肖林，2013）。

社区权力的形成过程存在“政府行政权力主导”或“社会自治权力主导”的争论。张磊和刘丽敏（2005）描述了物业运作空间中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博弈，发现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权力与空间的争夺，最终国家权力过度渗透的倾向和社会权利不足。肖林（2010）提出社区发展的路径遵循从陌生人社区到弱熟人社区到熟人社区的演进过程，过程中国家权力逐步退场而社会权力逐步进场。李友梅（2003）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资源协商与交易，双方都试图凭借权力成为规则的主导者进而影响对方的决策。王星（2008）质疑了国家与社会简单的“权力进退说”，认为政府与市场围绕着土地公共产品，充满利益纠结和冲突。朱建刚

(1997)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于权力界限不明确、行政权力膨胀、缺乏监督,可能诱发冲突,应努力向良性互动状态发展。还有不少学者试图描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发展方向,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最终应达到“融合”状态(徐中振、李友梅,2003),但对于合作或者融合的特征及发生过程缺乏详细论述。何艳玲(2007)将后单位制街区“国家-社会”关系称之为“权变合作主义”,聚焦于基层政权、市民组织、市民个体之间在复杂情境下产生的不同关系与行动策略。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一、 概念界定

国内“社区”概念具有学术层面和政府层面两种属性上的意义。

学术层面的探讨源于滕尼斯(2010)所述共同体意义的社区,即“现实和有机的生命,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尽管有种种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现代社区的含义具有新内涵即“社会关系共同体”(徐中振、李友梅,2003:103)。不仅包括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还有超越社区概念的网络交往共同体。居民的身份、技术、信息、决策等常常处在流动中,进一步形成流动社会(李友梅,2003)。肖林(2011)认为现代社区具有“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性”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二重性特征。由上述可发现,新社区内涵与韦尔曼(1979)提出的社区解放论相关联,将个人的社会网络当作社区,研究“不受地域边界限制的、由个人一定强度和频率社会互动基础上形成的强关系”(黎熙元、陈福平,2008)。然而,这种忽视地域界限的取向引起部分学者的反思。由于家庭本位差序格局是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的基础,社区具有“先赋性”地域特征,因此无法完全抛开地域界限的影响。

第二种取向是近年来在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理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政府取向。该取向中的社区概念从行政区划入手,结合社区与地域。何海兵(2003)认为社区建设存在“行政化”和“社会化”两种取向。前者将社区建设等同于基层政权建设的工具,其运作机制在于行政吸纳社会,即通过整合社会中的资源来推动国家基层政权建设,是社区行政建设的过程(朱建刚,1997)。后者从“国家-社会”范式入手,提出“小政府大社会”模式,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走向社会自治。在政府取向下,社区不仅是地域界限明确的“地域生活共同体”,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mailto: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